

9·30运动和国家罪行第十三章

9·30运动之后的印尼共产党（2）

作。他们甚至把自己当成应受人伺候的土皇帝。

在南勿里达他们还想继续过城里的资产阶级生活。最简单的例子是卫生问题。村民的房子没有水泥或瓷砖的地板。脚下就是夯实的土地。乡下人习惯在自家地上吐痰。这些大人物感到恶心，害怕踩着地上别人吐出的东西，所以他们要求与他们住在在一起的乡下人停止随地吐痰，并给他们空罐头当痰盂放在屋角。有些高级干部，尽管已经在乡村，仍然希望享用城里的食品和香烟。他们通过交通员从大城市购买所需商品，如 Gudang Garam、Bentoel、Djie Sam Soe牌的香烟，Lip Lip Hiong牌的花生。这些城市商品包装的垃圾吸引了国家安全人员的注意。他们发现了有城里人在这里出没，因为乡下人不太可能买这些物品。这使得镇压部队很容易找到印尼共领导人藏匿的地点和指挥武装斗争的根据地。

参加南勿里达集团的一些华人青年则有助于增进这些城里人和当地村民之间的关系。他们用针灸技术成功为村民治病，帮助他们解决各种健



毛泽东与苏加诺

康问题，而无需他们所买不起的药品。

穆尼尔说，如果所有的武装活动推迟半年进行，而让印尼共产党领导人有足够的的时间适应乡下老百姓的生活，不在被追捕的情况下在南勿里达地区仓促部署武装力量，情况的发展会有所不同。

最明显的问题是印尼共产党的领导缺乏部署武装斗争的经验。实际上，在抵达南勿里达之前，他们都不是打游击的高手。游击战的知识是从毛主席领导中国革命的书上学来的。但他们没有正确而谨慎地遵照这些书上所说的去办。武装力量小而分散。在最关键的时候指挥中心不能及时发出明确的命令和

指导。

选南勿里达为“根据地”，只因为这里是印尼共产党在大选时得票最多的地区。如此定义根据地肯定是不恰当的。只有在印尼共产党的所有决定在南勿里达绝对有效时，才可以说此地区是印尼共的根据地。但事实并不是这样。

最严重的错误在于部署武装力量的方法，都是在仓促之中进行。没有耐心，只想速胜。

不耐心必然造成准备工作粗糙。武装力量的部署应该能在第一次进攻便获得胜利。而事实是武装力量的部署是在领导者们被追捕的情况下进行的，以致于部队并没有得到周密、严

谨、细致的巩固和加强。

苏卡特诺和哈尔多约在仓促中带领同情印尼共的士兵们携带武器离开了印尼武装部队，加强在南勿里达的武装运动，印尼共却没有做好接收他们的准备，没有考虑怎样给来到南勿里达的这么多部队提供食物。

他们最终被迫抢劫。原先被抢的被认为是残忍的有钱人。但是，因为抢夺量增加，残忍的定语不再使用，甚至许多普通百姓也被抢。对自己根据地的居民进行抢劫，当然不是自称为“共产主义者”的人的作为。

这些武装抢劫本身也引起了国家安全人员的注意，苏哈托军人政权很快便得知在南勿里达有武装活动。苏哈托军事当局立即展开调查并加紧围攻南勿里达。本来可以帮助南勿里达武装运动的富裕居民，由于经常被抢，已成了印尼共的敌人。他们帮助军人政权摧毁了印尼共在南勿里达的军事行动。

南勿里达失败的速度很快，因为一些被捕的印尼共领导人的叛变非同一般。南勿里达印尼共主要领导人苏万迪向敌人披

露了已建成的基地和隧道。他不仅叛变，而且还为军事当局工作。他还积极鼓励南勿里达人民帮助政府镇压印尼共产党的武装队伍。除了印尼共产党内的人背叛之外，军政府也很容易派人潜入南勿里达印尼共组织。因此，政府能很方便获得并跟踪武装力量的动态情报。

当1968年军队开始进行追捕时，许多印尼共产党领导人显然已经动摇了。他们竟离开了自己所领导的队伍，只顾自己逃命。这使当地人很失望。他们不再愿意帮助抵抗运动及其领导人。

袭击从地面和空中进行。主要袭击发生时，南勿里达的领导人正聚集在一起开会计划在外南梦和万丹地区开展武装斗争。加里曼丹和苏拉威西的干部也参加了武装斗争的课程。奥罗安·胡塔佩亚和苏拉赫曼在袭击中丧生，所有与会的印尼共领导人被捕。许多被捕的印尼共领导人成了叛徒，泄露了该党在准备南勿里达运动期间所有的秘密和组织，有的甚至在审查其他被捕的印尼共成员时充当审讯人。